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

要不要取消本科毕业论文

■郭英剑

在我看来,媒体讨论聚焦的“中山大学新规——本科生毕业论文不能写综述类论文”的问题,其实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公众对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关切,二是本科毕业论文究竟要不要写,如果写,应该写什么以及怎么写。

但在讨论之前,首先有必要理清为什么本科生要写毕业论文的问题。从目前看,做出这一要求有如下几点理由:

第一,前提条件。现在,几乎所有四年制高校都对本科生做出论文要求,这是其大学毕业以及获得学士学位的前提条件。

第二,学术训练。一般认为,毕业论文是对本科生进行的最后一次较严格的集中学术训练,可以帮助其了解学术写作的目的与规范。

第三,综合能力。论文写作被认为是对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方式方法之一,也是人才培养重要环节,有助于考察学生的思维方式、表达能力、驾驭文字能力、动手设计能力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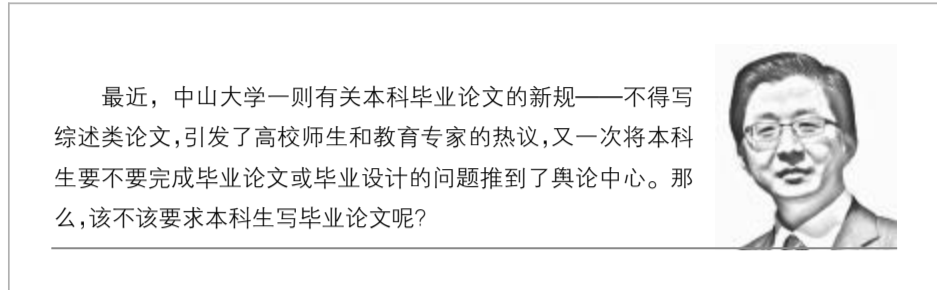
不尽如人意的毕业论文

虽然目前高校都会要求本科生写作论文,并将其作为毕业的前提条件,但论文的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对此,师生也都颇有微词,论文写作对双方来说,都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其主要原因表现在——

首先是态度问题。本科生对毕业论文写作并不重视,因为其写作时间与实习、找工作时间冲突,学生很难将时间、精力投入其中。这就导致不少学生产生马虎应付、得过且过的想法与做法。

其次,指导问题。论文质量除得益于学生的态度外,教师的指导、把关也很重要。虽然确有导师对此有失职行为,但应该还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因为心善而过于宽容。很多教师对学生难以投入精力于论文时虽有怨言,但想到本科生工作、实习的具体压力,也就给予了理解。最终论文只要不是实在看不过去,一般都会准予放行。

再次,监管问题。毕业论文理应由学术委员会和学位委员会进行监管,但本科毕业论文却不像研究生毕业论文那样,有严格的监管制度与措施。所以,人们会经常听到有硕士生和博士生因论文通不过而拿不到学位,但本科生



最近,中山大学一则有关本科毕业论文的新规——不得写综述类论文,引发了高校师生和教育专家的热议,又一次将本科生要不要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的问题推到了舆论中心。那么,该不该要求本科生写毕业论文呢?

却很少如此。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本科生毕业论文?如何保障其具有一定学术水平?在这方面,国外高校的做法又有哪些启示?

英国:本科生无需提出新观点

与我国相似,英国高校也大多要求本科生写作毕业论文,其常规看法与要求如下。

首先,本科毕业论文(或学士学位论文)是对某主题的研究、写作的扩展,通常在学位课程最后一年完成,主要根据学生感兴趣的领域选择主题。学生可自选导师。导师会在其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提供指导和支持。

其次,本科论文与研究生论文差异很大。这首先体现在文章长度上。学士学位论文平均只有1万~1.5万个单词。

再次,本科论文不需要具有与研究生工作相同的原创性。虽然要求学生独立完成工作并引用所有资料,但明确要求:本科生无需提出任何新观点。他们只要能深入、持续研究,并对研究主题提出批判性讨论就足够了,不必讨论研究的哲学背景或设计独特的方法。

当然,他们也没有忘记提醒说,最好的学士学位论文还是能够显示出真正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并且具有对许多不同来源的信息进行整合的能力。

美国:优秀毕业生才写毕业论文

一般而言,美国高校基本不对本科生提出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除非有两种情况。

第一是优秀毕业生。对大多数毕业生来

说,只要修满课程且成绩通过,就可获得学位。写毕业论文则被认为是额外选择,只有聪明好学、愿意获得优秀毕业生称号,以及从事相关专业研究的同学才可选择写毕业论文。

一般来说,凡完成了本科论文的人都会获得荣誉毕业生的称号。而这种荣誉在现实中的确可以使本科生在研究生申请和就业中占据优势。

第二,特殊专业需求。有些新专业因为具有创新性和一定难度,所以将写作毕业论文当作学生选修的条件之一。如前几年,斯坦福大学开设了一门跨学科研究的本科专业,其除对学生提出选修三个以上不同研究领域课程的要求外,还要求学生写作毕业论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限制一般学生、挑选优秀学生的手段之一。

需要注意,虽然本科毕业论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而艰巨的项目,但美国大学也强调其不应与研究生水平的论文相混淆。他们认为后者的难度要大得多,其涉及的研究也要多得多,而博士学位论文更是一个为期数年的项目,代表一个领域的实际发展水平。他们提出的比喻是,本科论文更像是一篇篇幅有所扩展的学期论文,代表着整个大学期间自己专业所学达到了一个顶点。

本科毕业论文能否取消

通过观察英美高校的做法,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如下两点启示:

第一,可以考虑取消本科生毕业论文的刚性要求,将其自主权交由高校做决定。如果取消本科生论文,理由似乎很充分。

高教观澜

大学发展需解决好深层学理问题

■储朝晖

中国大学发展已经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近2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同时,受到急功近利潮流冲击,规模扩张较快,品质提升较为缓慢,原创性不足。在解决问题时,又较多地从微观、具体层面寻求解决办法,对大学发展的基本理论研究不重视,也不充分,或采取悬置理论的逃避策略,使一些深层次重大问题的解决缺乏必要基础理论支撑。开阔视野,开放观念,探明大学发展的学理,才有可能既有理论深度,又能有效解决教育品质提升问题。

大学发展的学理包括大学发展的规律、原理、逻辑、原则以及大学各相关当事人的关系、定位与相互作用的基本理论。研究大学学理本身的理论性、复杂性、尖端性,使得该领域的研究自现代大学建立后就属于凤毛麟角。同时,由于学理的研究需要较长时间验证,在现有的大学评价体系中做学理研究的人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从而抑制了对于大学学理的研究。

当下,大学发展急需回应的主要学理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大学相对于人的价值是什么?中国颁布的第一部《大学令》里就明确大学要“研究高深学问,培养高级人才”。这个界定显得狭窄,而当下,更极端的是一些人仅把大学当成学历和学位的

发放者、项目和荣誉的生产机构,未能充分发挥大学对学生个性化成长发展所不可替代的赋能、价值引导、潜能激发、专业提升、社会资源拓展作用;或者在学中对项目的重视程度高于对人的培养,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

大学与真理的关系是怎样的?世界不少大学的校训将“真理”作为其中的关键词,这就是基于对大学与真理关系的理解。中国在经历新文化运动后,教育得出了为各门科学所能普遍认可的结论:“要科学,不要迷信;要民主,不要专制。”其显现出对真理探索的追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内外部环境的改变,不能确保大学人对真理抱有不断求索的赤诚之心,一直是所有大学每个时期都面临的挑战。

大学与权势的关系如何?大学自身的学术就是一种权力,大学之外还有多种权力存在。如何恰当处理大学与各种社会权力的关系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理想主义者倾向于大学独立于各种社会权势;功利主义者热衷依附各种社会权势;理性主义者则谨慎对待各方社会权力。不接触自然过于天真,关键在于大学秉持怎样的原则与标准与社会各方权力机构及其当事人交往。

大学与世俗社会的关系怎样?“象牙塔”是人们心中大学在世俗社会中的象征。在大学

普及化后,大学事实上提供的是民生服务,大学教育需要不断深入生活,深化市场参与。在一个越来越扁平的社会中,大学需要适应与社会各主体平等交往,需要担当促进公平的责任,服务学生成长发展。但是,大学服务社会不同于一般机构与公司,需要立足于为人的成长发展服务。

不同大学又需要找到符合自身条件和特点的定位,不能简单模仿,要评价自己对社会资源的使用能产生多大的增值。

大学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难题,最终需要从学理上寻找依据加以解决。近些年,社会对大学的批评较多,大学发展受各种因素影响,产出增大的同时,形式化的学术倾向突出,简单重复增多,独创性贫乏,思想深度和实践效力不足,高质量原创成果太少。大学在回应社会批评、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时,不妨首先追问一下,这样做符合大学的本质吗?是否与大学的目的相一致?是否能更有效彰显大学的价值?

当然,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不能简单地以是或否作答,也不存在对所有大学都适用的标准答案,需要各自依据自身条件和状况做深度学理研究。不少大学或借口自身缺乏教育学研究人员与团队,或寄希望于借用别人在基础学理上的研究成果,或习惯于简单套用,忽视或略

误了对适合自身的学理研究,以致酿成大学发展经过很多年努力也难以弥补的决策失误。实地调查显示,发生过此类失误的大学为数甚多。

对大学发展学理的研究本身需要较高的理论素养。相较技术领域创新,基础学理原创更为艰难,需要对思想、原理、概念进行纯粹、科学、持续不懈的艰难探索,需要质疑和批判、哲学探索的勇气,以及进一步解放思想。同时,需要在理论意境、研究视域、核心问题等方面进行拓展,尤其需要消除阻拦正常学术思考的投射效应,消除漫长的单一阅读和思想禁锢中养成的不思想、不思想、不能思想的现象,改变以学术正统束缚教育学理发展与原创的僵持状态。

但大学发展学理研究又不是纯理论研究,而是需要结合大学具体的发展历史、现状、文化、体制、条件、机遇进行针对性研究。各校要有意识地培养对本校有深度了解、有责任担当、有特殊情感的学理研究者,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为本校的发展从学理上把脉问诊,在基本和重大问题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大学发展见解。

(作者系中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为2019年度基本教育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中国教育学70年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GYH2019002)的部分成果)

“此次疫情给教育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把在线教育‘逼’出来了。”11月27日,在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社会战略专委会主办的疫情后教育发展策略研讨会上,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霍国庆如是说。

然而,一个“在线教育”显然不是后疫情时代我国教育可能产生变化的全部。相较于此,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则是——在后疫情时代,我国的教育应该变成什么样?

这也是此次与会专家们讨论的重点。

教育不应等同于培训

讨论教育发展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才是“教育”。而在霍国庆看来,这个命题并不简单。

“在我看来,教育应该是没有目的的,如果教育有了明确的目的,那应该叫‘培训’。”霍国庆坦言,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整个教育系统其实有些“名不副实”。“因为从幼儿园开始,我们的教育几乎都在为高考做准备;大学教育则是为了帮学生找一个好工作。”

简而言之,当前我国的教育依然存在目的性过强的问题。

对此,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韩景阳在发言中表示,在教育过程中,知识的传授应该是最基础的部分。以此为基础,进而培养学生各种能力,“特别是思辨能力、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的能力”。在此之上,则是价值塑造,即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这应该是一个完整教育的主要部分。”韩景阳说,但要实现这种三位一体的培养模式,显然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教师的职责应是“向导”

在发言中,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元丰表示,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带动下,目前各行各业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教育行业同样需要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

不久前,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该报告预测了2025年,全球就业市场最需要的10类能力。其中,位居前三的分别为分析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主动学习能力和学习策略,以及复杂问题解决能力,我国教育十分注重学生读、写、算等能力则不在其列。

对此,王元丰坦言,未来的教育要回归本源,教育的使命将是激发学生自身的奋斗精神、创新思维和责任感,这也是教育真正的价值所在。为此,首先需要作出调整的就是广大教师群体。

“在传统观念中,教师的作用仅仅是充当学生的知识传授者。然而,如果以提升学生的能力为目的,教师最主要的职责就应该是充当学生的‘向导’。”王元丰说,所谓“向导”,即要引导学生面对本领域最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并激发学生解决问题的动力和信心。

“教育更重要的作用是要点燃‘火炬’,让一个人的心灵能够充实,激发学生的奋斗精神。作为老师,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王元丰说。

科研机构对研究生教育应加强贡献

如果说前述几位学者关注的更多是教育之“道”,那么中国科学院前沿科学与教育局副局长王颖则更加关注教育之“术”。在发言中,针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结构性问题,她呼吁加强科研机构的相关贡献度。

王颖表示,我国在建立研究生制度之初,施行的便是“双轨制”,即除高校外,科研机构也被赋予了授予学位的权利。然而,目前国内高校中有25%的高校可以招收研究生,相比之下,国内300多所科研机构中,仅有7%可以招收研究生,这一比例有些过低。

“与高校相比,科研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是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比如科研项目更加丰富且实际,经费也相对更加充足。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科研机构在研究生培养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她说。

对此,王颖建议,应探索以科研机构为基础设立研究生大学,完善相关规定,将研究生大学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同时,鼓励具有学位授予权的科研机构与高校联合招生培养,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经教育部备案后,允许科研机构与大学联合授予学位。

此外,王颖还表示,国家应设立相关专项,鼓励科研机构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有些中央部委下属的科研机构,其研究领域非常适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但目前这些机构反而受到限制,导致其只能培养学术型研究生,这一状况也应该得到改变。”

后疫情时代,教育应该什么样

■本报记者 陈彬

溯;单位招标采购流程简单易用,既满足了单位限额以下“询价”的要求,又为需求征集及商品取得过程的合法性提供了依据。”

同时,平台销售的货品价格竞争明晰,产品特点一目了然。科研人员下单后,订单被提交给科研院所、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审批,审批通过,订购即成功。随后,商家将对订购货物进行配送,经研究机构物流窗口验货后送到各实验室。验收完成后,这一订单即进入结算流程。

经过这一系列的规范操作,科研人员的采购时间大大缩短,又杜绝了假业务骗取科研经费、假票据套取财政资金等现象。广州医科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启动统一采购平台以来,学校在开展的各类报销票据网络验证工作中,未发现假票据情况。

在喀斯玛的帮助下,广州医科大学“五化”并举,破解科研管理体制障碍成效显著。

广东省教育厅高度认可并转发《广东改革工作简报:广州医科大学“五化”并举破解科研管理体制障碍》的通知,号召高等院校认真学习广州医科大学所取得的经验,并根据学校实际持续深化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建立健全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进一步释放科研创新活力。

张平认为,喀斯玛在广州医科大学科研采购管理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标志着平台的信息化采购管理模式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更表明运用平台模式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随着国家进一步推动‘放管服’的实施,经费管理权限还将进一步下放,借助互联网技术加强科研领域廉洁从业风险管控、规范科研经费管理,就会成为必然的趋势和需求。”张平说。

“灰色采购”几时休

——来自“广州样本”的启示

■齐时高铭

供求信息不对称,“水货”假货横行,供应商鱼龙混杂、恶性竞争,虚假发票、虚假交易屡禁不止……每天发生在电商圈里的“狗血”事,其实在科研界也并不罕见。科研采购市场的“不透明”,不仅给科研人员带来了巨大的风险隐患,更对科研单位的监管、报销、审计等工作造成诸多困难。

为解决科研物资采购交易中存在的难题,2013年,中国科学院指导所属企业创建了喀斯

玛平台。7年来,平台依靠互联网技术,打造行业领先、跨越全产业链的“阳光采购、规范管理”的B2B+O2O科研服务平台,时至今日正在为越来越多的科研院所、高校、科研物资供应商所接受、推荐和使用。

2019年,为持续深化科研管理“放管服”改革,广州医科大学启用了新的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也就是“五化”——项目管理自主化、经费审批便利化、物资采购规范化、财务报

销统一化、技术支撑信息化。喀斯玛就此进入广州医科大学的视野。学校将喀斯玛作为教学、科研试剂耗材等物品的采购平台,以期实现物资采购的规范化。

广州医科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启动统一采购平台以来,学校在开展的各类报销票据网络验证工作中,未发现假票据情况。